

HOW THE NATION VIEWS THE PUBLIC SCHOOLS

The Reports of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s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from 1969 to 2007

# 美国公众 眼中的公立学校

——1969—2007年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

范国睿 刘 涛 王佳佳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美国公众 眼中的公立学校

——1969—2007年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

范国睿 刘 涛 王佳佳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韦 禾  
版式设计 尹明好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公众眼中的公立学校: 1969—2007 年卡潘/盖洛普  
教育民意调查报告 / 范国睿, 刘涛, 王佳佳主编. —北  
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41 - 4312 - 9

I. 美… II. ①范…②刘…③王… III. 公立学校—学校  
教育—研究—美国 IV. G5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62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9 - 0233 号

---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2
邮 编	100101	网 址	<a href="http://www.esph.com.cn">http://www.esph.com.cn</a>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61.7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1 200 千	定 价	11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从教育舆情的历史变迁看 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

## （代 序）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政策学博士点建设和“985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的教育政策研究团队一直关注国内外教育舆情与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进展。2007年秋，一次偶然机会，我们注意到“卡潘国际”（Phi Delta Kappa International）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1969—2007年“卡潘/盖洛普对公立学校的民意调查”系列报告的电子版下载服务。我们的第一判断是，这一系列调查对我们研究美国近40年的教育政策变迁甚至是整个教育改革与发展都非常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研究者多集中于引介美国“先进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往往反映的是美国专业研究人员眼中的美国教育，但是很少有人从美国公众的角度审视美国学校教育系统，更缺乏对美国研究机构跨年度、大样本、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民意调查的引介和研究。据我们所知，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是美国历史上较早的、历时最久的、最成熟的、影响最为广泛的专业性教育民意调查。因此，我们决定翻译、汇编这39年的民意调查报告，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推进国内对美国教育的深入认识，并为国内的教育研究界带来某些方面的转变。秉持这一信念，我们着手与卡潘国际联系。我们的编译计划很快得到以主编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为首的《卡潘》（*Phi Delta Kappan*）董事会的大力支持。经慎重讨论，《卡潘》董事会最终同意授予我们免费版权。得此授权以后，我们立即将该项目列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政策学博士点建设和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教育政策研究项目，形成了具体的编辑、翻译计划，组建了翻译研究团队，完成了与卡潘机构的授权文件。翻译工作从2007年11月开始，初稿于2008年5月基本完成，经3个月的校核，终于在8月底将定稿交付出版社。

对中国教育学者而言，《卡潘》可能并不是一个陌生名字。卡潘<sup>①</sup>是美国最优秀的教育机构之一，成立于1906年；《卡潘》是卡潘机构旗下的一本著名教育杂志，是美国引用率最高、在全世界有特定读者群的教育类杂志。卡潘在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服务机构。从1956年起，其国际总部（即卡潘国际）在美国印第安纳州

---

① 卡潘与卡潘国际其实是同一家机构，因为卡潘在世界各地都有机构，所以通常称其为卡潘国际。

布卢明顿市设立。卡潘国际，致力于服务全国社区中的教育者和公立学校，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从公共利益出发，维护与发展民主生活的方式。作为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合作伙伴，《卡潘》具有公布这项民意调查报告的优先权，从1969年开始，《卡潘》在每年出版的一期杂志上发表当年的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从而成为美国教育輿情的风向标。

## 一、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历史与变迁<sup>①</sup>

美国公众每年都非常期待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的问世，这项历经40年的民意调查在美国受到广泛尊重。不过，也有人不满意这项调查。多年来，这项民意调查的结果称公众给当地公立学校较高的评价，针对这项调查结果，美国前教育部部长评论说，“如果人们继续认为他们的公立学校很好，就永远不会产生教育变革的需要”。不管怎样，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前辈们一定没有想到，这项跨越40年的民意调查，已经在各个方面日趋于成熟，并在美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卡潘与盖洛普组织精诚合作的结果。这项民意调查最初是凯特林基金会颇有声望的董事查尔斯·F. 凯特林二世（凯特林基金会的创始人查尔斯·F. 凯特林的孙子）与爱德华·布雷纳德的主意。他们期望这项民意调查能够给教育者提供公众对日常教育议题的看法。他们的想法获得了民意调查专家乔治·盖洛普的支持。盖洛普对公立学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并且成为这项民意调查的第一任负责人。这项民意调查从1969年开始，由查尔斯·F. 凯特林二世建立的CFK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赞助，民意调查的具体筹划和运作由盖洛普组织负责，1969年的调查结果全文发表在教育活动发展研究所（凯特林基金会下属的一个教育研究机构）的报告上。由于第一届教育民意调查非常成功，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扩大这项民意调查的影响力。后来，《卡潘》主编斯坦利·伊拉姆与CFK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布雷纳德（他当时已经接受了查尔斯·F. 凯特林二世的邀请，加入了CFK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并很快与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项目签约，为《卡潘》取得了优先发表这项民意调查报告的权利。这项民意调查直到今天都是《卡潘》一大特色，而且在使《卡潘》成为美国教育类杂志引领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项民意调查发展的早期，每年举行的由全国专家组成的调查筹备会议都由乔治·盖洛普主持，在每年的会议上他都会给大家作一个演讲，而且再三强调“公立学校没有很好地营销自己”。会议中，他喜欢提问，然后仔细听取大家的建议，并认真记录每一个人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会感谢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负责起草民意调查的问题，准备调查问卷，指导民意调查的过程。当调查结束后，他分析调查结果，挑选重要发现，撰写调查报告。从1969—1984年，乔治·盖洛普一

---

<sup>①</sup> 更多有关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历史与变迁请参见：Lowell C. Rose, *Centennial Reflection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Phi Delta Kappan, Vol. 87, No. 08, April 2006, pp. 631 - 633. 不过文章中有一个小的错误，误将 Charles F. Kettering II 写成 James Kettering。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得到《卡潘》主编的确认。另外，卡潘国际2007年年底报道了罗斯去世的消息，我们得知后非常痛心，决定以此文来纪念他，并感激他对这项民意调查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直亲自撰写每一年的调查报告，他把这项工作当作自己的乐趣。《卡潘》方面，伊拉姆负责编辑这份报告，经过与盖洛普的核对，最终将这项民意调查报告发表在《卡潘》上。

非常不幸，查尔斯·F. 凯特林二世于1971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建立的CFK有限责任公司对这项民意调查的资助一直持续到1973年，1974年福特基金会临时赞助了一年，1975—1980年，凯特林基金会通过旗下的教育活动发展研究所对这项民意调查提供了为期6年的资助。1981年和1982年，卡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莉莉捐赠基金的协助下对这项调查进行资助，并且完全控制了这项民意调查。从1983年之后，卡潘完全独立地负责对这项民意调查的资助。1981年，伊拉姆从《卡潘》退休，并被聘为特约编辑，继续担任卡潘民意调查项目的负责人。1984年，乔治·盖洛普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儿子亚力克·盖洛普作为盖洛普公司的联合主席之一接替他父亲，继续与卡潘的编辑们进行合作，并撰写调查报告。调查问题的审查、调查过程的管理、调查结果的汇编还是由盖洛普公司全程负责，而最终的调查报告则是由《卡潘》编辑、发表。从1989年起，伊拉姆开始与亚历克合作撰写调查报告，1991年起，洛厄尔·罗斯也参与合作撰写调查报告。从1992年起，卡潘用“卡潘”和“盖洛普”共同命名这项民意调查。从1998年开始，罗斯完全接替伊拉姆的工作，直到2007年年底，他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可以从下表直观地看出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40年的变化历程。

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发展与变化

年份	报告名称	撰写者	赞助基金
1969	HOW THE NATION VIEWS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CFK Ltd.
1970	THE 2ND ANNUAL SURVEY OF THE PUBLIC'S ATTITUDE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CFK Ltd.
1971	THE 3RD ANNUAL SURVEY OF THE PUBLIC'S ATTITUDE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CFK Ltd.
1972	THE 4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DUCATION	乔治·H. 盖洛普	CFK Ltd.
1973	THE 5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DUCATION	乔治·H. 盖洛普	CFK Ltd.
1974	THE 6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DUCATION	乔治·H. 盖洛普	福特基金会
1975	THE 7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DUCATION	乔治·H. 盖洛普	凯特林基金会
1976	THE 8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凯特林基金会

续表

年份	报告名称	撰写者	赞助基金
1977	THE 9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凯特林基金会
1978	THE 10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凯特林基金会
1979	THE ELEVEN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凯特林基金会
1980	THE 12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凯特林基金会
1981	THE 13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莉莉捐赠基金、卡潘
1982	THE 14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莉莉捐赠基金、卡潘
1983	THE 15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卡潘
1984	THE 16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乔治·H. 盖洛普	卡潘
1985	THE 17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86	THE 18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87	THE 19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亚历克·M. 盖洛普 大卫·L. 克拉克	卡潘
1988	THE 20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亚历克·M. 盖洛普 斯坦利·M. 伊拉姆	卡潘
1989	THE 21ST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90	THE 22ND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卡潘
1991	THE 23RD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92	THE 24TH ANNUAL GALLUP/PHI DELTA KAPPA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续表

年份	报告名称	撰写者	赞助基金
1993	THE 25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94	THE 26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95	THE 27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洛厄尔·C. 罗斯	卡潘
1996	THE 28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斯坦利·M. 伊拉姆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97	THE 29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斯坦利·M. 伊拉姆	卡潘
1998	THE 30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1999	THE 31ST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0	THE 32ND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1	THE 33RD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2	THE 34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3	THE 35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4	THE 36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续表

年份	报告名称	撰写者	赞助基金
2005	THE 37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6	THE 38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7	THE 39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洛厄尔·C. 罗斯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2008	THE 40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威廉·J. 布尚 亚历克·M. 盖洛普	卡潘

《卡潘》曾经分别在 1973 年和 1978 年两次对这项民意调查报告进行 5 年和 10 年汇编，并且出版成书《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1969—1973》与《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1969—1978》。在汇编报告中，卡潘和 CFK 为学校工作者免费提供《看看你的学区》(A Look Into Your School District)，这本手册为学校教育者的决策提供一种可供使用的调查程序，指导他们对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教育民意调查。除此之外，1980 年，卡潘在盖洛普组织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在社区中进行教育民意调查》(Polling Attitudes of the Community on Education, PACE)，以此帮助地方学区以及其他个人或组织开展民意调查服务项目。

多年以来，这项民意调查报告首次与公众见面总是在《卡潘》上。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卡潘和盖洛普组织有一项新的惯例，就是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国新闻出版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举办民意调查结果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在 2005 年迁至盖洛普大厦举行。至于这项民意调查的完整版本，则是在新闻发布会后的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内发表在《卡潘》9 月刊上，不过，卡潘国际的网站在新闻发布会的当天就向社会公布这项民意调查报告的电子版。

随着这项民意调查在篇幅和内容上的增加，卡潘开始考虑，许多人并不会完整地把它读下来。因此就产生两项改变。每一份民意调查报告以一个简短的摘要开始，随后是主要结论。每一个结论都有经过调查发现的数据表格的支持。只要愿意，读者可以尽可能地去查找和研究数据。第二个改变是，从 2000 年开始，卡潘加入了“政策建议”部分，这个部分主要突出与学校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关的调查发现。<sup>①</sup>

<sup>①</sup> 由于“政策建议”部分涉及大量图表，而且数据与正文内容雷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删减了卡潘的这项内容。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直接登录卡潘国际的网站，查找原始报告。

## 二、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特点、价值与启示

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已经跨越了40年。在这40年中，这项民意调查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在经历了赞助商的变更，撰稿人的更迭，美国教育问题的演进，调查内容的变迁，以及调查方法的更新之后，这项民意调查日趋成熟。今天，它的特点与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不仅受到美国社会、政府、教育研究界的瞩目，也必将吸引越来越多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教育领域不断发展的有识之士的目光，启发我们的思想与行动。

### （一）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特点

多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形成了这项民意调查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专业性与开放性

这项民意调查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和它密切相关的关键人物和机构非常专业。乔治·盖洛普是20世纪最伟大的民意调查专家，他创建的盖洛普组织是美国最著名的专业民意调查机构。由他主持的教育民意调查从调查技术的专业性上来讲无可置疑，而且他还非常关心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CFK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布雷纳德曾经任凯特林基金会拨款部主任的经历，以及他本人的研究兴趣使得这项由CFK有限责任公司赞助的教育民意调查从管理和研究方面具备很强的专业性。最不能忽视的是CFK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建者查尔斯·F. 凯特林二世，他年轻时在科罗拉多大学取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眼光、懂教育、关心美国公立学校发展的投资者。由于他们以专业的水准和专业的精神开创了这项事业，后来者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将这项民意调查发展成为美国最具专业性的教育民意调查。

这项民意调查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民意调查问题的确定、受访者的回答以及调查问题与数据的使用三个方面。首先，在这项民意调查发展的早期，每年都会如期举行由全国专家组成的民意调查筹备会议，民意调查的问题总是在一个开放性的会议上经广泛讨论后确定的。后来，民意调查的设计者们开始从各地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那里选择要调查的主题、话题和问题。其次，这项民意调查不仅包括很多开放性问题，而且即使在回答封闭式选择题的时候，受访者也完全可以提供一个设计者没有想到的答案，这类答案被称为“自行标注”（volunteered answer）。再次，卡潘承诺各地教育民意调查机构和学校管理者可以免费使用盖洛普教育调查中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公众可以使用这些报告中的数据和信息，它们完全是开放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引用者按照惯例注明信息来源，并且确保引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即可。

#### 2. 科学性与民主性

乔治·盖洛普一生都在追求民意调查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具体到这项教育民意调查，几乎每年的报告都会给读者交代清楚研究程序、样本设计、样本误差、样本构成，以证明调查的科学性。正是因为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研究程序符合规范性、数据统计力求准确性，保证了它的科学性，使它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

如今，这项民意调查从筹备到公布结果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流程<sup>①</sup>。每年1月，民意调查的设计者们开始从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那里选择要讨论的主题、话题和问题；3月份，召集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提出建议、筛选主题和设计问题；4月份，确定最终主题，并从民意调查资料库中确认过去是否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同时草拟新的问题；5月份，民意调查的设计者们会复核问题的设计，检查它们在表述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否存在提问顺序上的偏见；6月份，将最终确定的调查问题编入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系统（CATI，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然后开始电话采访并收集数据，整个调查都经过了编码，而且最终的样本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经过了前期调查，7月，统计出具体的研究数据，其他内容刻入光盘作为资料保存；8月份，调查结果向新闻媒体、《卡潘》的会员、国会成员、各州的督学和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公布；9月份，报告全文在《卡潘》上发表。在科学性的基础上，民意才有可能最大程度避免被歪曲，民主性才有可能实现。

这项民意调查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一项民主实践。它的初衷就是反映全国公众对公立学校的态度。第二，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以多数公众的态度作为基础判断民意趋势的同时，通过人口统计学分析，使每一类群体的态度和利益都能充分体现。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又避免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政。

### 3. 丰富性与针对性

这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美国社会、教育研究界讨论的所有教育话题，同时直面美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所有真实问题，如教育公平（教育财政、残障儿童、教育券、学校选择权……）、教育管理变革（政府与学校关系、分权、公立学校体制变革……）、学校质量与效能（全国考试、国家课程、课业负担、公立学校评级、延长学日与学时……）、学生暴力与校园安全问题、学生吸毒、纪律问题、学校与社会和家庭的关系、道德教育、品格教育、教师待遇、教育民意调查与美国大选，等等，确实是深入洞察美国教育的宝贵资料。

1969—2008年民意调查报告会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报告中问题数目的变化。1969年民意调查一共17个问题，2008年达到44个问题。尽管问题的数量增加了，但是调查的主题并没有显著增加。第一届民意调查的问题很分散，近几年民意调查的问题更集中，更有针对性，而且一个主题下有多个子问题。例如，2007年民意调查有43个问题，14个直接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相关。

### 4. 趋势性与时代性

趋势性是这项民意调查区别于美国其他教育民意调查最主要的特点。对重点问题的长期调查，为解释美国教育问题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重要基准。不过趋势性问题的表述必须准确、统一，这是盖洛普组织坚持强调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都会使趋势线变得无效。趋势性问题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美国社

---

<sup>①</sup> 参见 William J. Bushaw & Alex M. Gallup. The 40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J]. Phi Delta Kappa, 2008 (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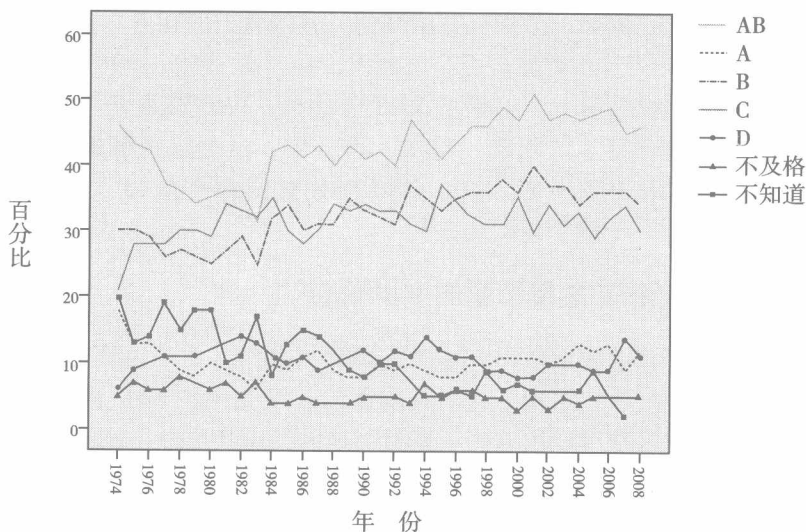
会积累了宝贵的民意数据库。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趋势性问题的重要意义。

最好的例子是以下这个开放式的趋势性问题，“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的公立学校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曾经，卡潘试图说服盖洛普组织不需要每年都问这个问题。但是，亚力克坚决反对，他指出，如果卡潘不问这个问题，盖洛普组织就自己出钱赞助关于这个问题的民意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交给卡潘。盖洛普组织对趋势性问题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个典型的趋势性问题是“给公立学校评级”。这是一个最能调动公众积极性，也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问题。为了便于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所反映的民意趋势，我们将40年报告的数据汇总制成了如下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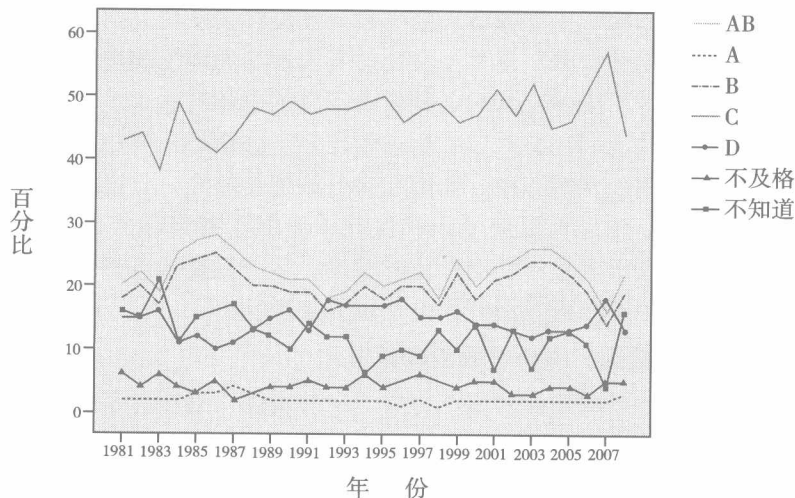
给当地公立学校评级 (1974—2007)

全国总数



给全国公立学校评级 (1981—2007)

全国总数



1974年第一次请公众给当地公立学校评级时，48%的人给当地公立学校评A或B，2008年这一数据为46%；1981年起，请公众给全国公立学校评级时，20%的人给全国公立学校评A或B，2008年这一数据为22%；1985年起，公立学校的家长被要求给他们最大孩子就读的学校评级，那一年71%的人评A或B，2008年这一数据为72%。这些趋势性数据削弱了美国社会中一个常见的观点，即公众对公立学校的支持率在降低。这些数据反映出，公众喜欢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学校，不喜欢其他学校。

这只是这项跨越40年的教育民意调查中的两个趋势性问题，我们相信本书中还有更多等待读者去挖掘的重要数据，以及更精辟的分析。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主题都值得进行追踪调查，调查所涉及的各个主题都具有时代性，都有可能过时。淘汰过时的问题，敏感地加入新问题是这项民意调查的设计者必然会考虑到的。例如，劳资双方的谈判、教师罢工的观点有它存在的历史条件。1969年民意调查问公众教师是否应该加入工会，从1969—1981年，一共问了四次，是否应该允许教师罢工。但是从1982年之后，民意调查就再也没有关注过劳资双方的谈判与教师罢工的问题。同样，2003年，这项民意调查开始关注公众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看法。2007年民意调查共有43个问题，其中14个直接聚焦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 （二）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价值

尽管卡潘每年都会谦虚地指出这项民意调查具有两方面的价值——（1）提醒决策者注意公众对各种教育问题、计划和政策的态度变化，（2）调查数据作为一个全国基准，任何社区都可以用这些数据与当地的民意状况进行比较，我们还是无法用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这项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教育民意调查的全部价值。鉴于此，笔者就这项民意调查的核心价值总结如下。

### 1. 创建教育民意平台，反映美国教育舆情

美国大部分公众都经历过学校教育，对教育问题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见解。这项民意调查为美国社会创建了一个教育民意平台，使美国公众可以自由地表达出他们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意见和看法。这个平台能够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美国教育舆情的现状和变化。它既能反映出美国公众对各种教育问题的总体看法，也能反映出各主要群体的态度倾向，以及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公众可以使用这个全国性的教育民意平台，了解其他公众的态度，他们与自己的态度差异，自己的态度倾向在全国所占的比例，等等。这样可以使个人和各群体全面了解其他人、其他群体的态度，有利于纠正自己由于信息不畅而形成的偏见，在今后更加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整体上促进美国教育发展的舆论环境更加理性。

### 2. 积累民意调查数据，服务美国教育政策

过去多年民意调查所积累的数据已经形成了数据库，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来追踪民意的变化和趋势。它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一位研究者称其为“无价的宝藏”。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民意调查数据能够给政策制定

提供信息。1983年,《国家在危急中》(*A Nation At Risk*)发表,这份报告呼吁延长学日和学年。198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公众反对这项提议。很多年后,一些督学称,“如果卡潘早一点报告这项民意调查结果,我们就会省去很多麻烦了”。督学的反应引出了这项民意调查非常重要的一点:调查结果能及时地反映公众的态度,却不应该直接用来制定政策。民意作为敏感信号,能够提醒决策者在推进政策的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并且意识到任何政策都需要获得民意的支持,但是民意调查结果本身并不应该成为放弃或采纳任何政策计划的原因。

### (三) 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启示

虽然布鲁斯一再强调要谨慎地对待这项民意调查的数据,不能直接依据它们来制定教育政策。但是,对于中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来讲,这种对基于民意调查的教育政策的渴望可能是他无法理解的。我们无意在这里对中国宏观教育政策进行评论,但作为深入了解过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宏观教育政策研究在不久的未来发生以下四种转变。

#### 1. 转变视角:从专家视角转向公众视角

这项民意调查给我们最大的冲击在于,它完全是公众视角,或者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公共利益出发,维护与发展民主生活方式。在我国,教育政策的走向除了受到政治家的左右,在其身后往往还有该领域学术权威的身影。其实,这在世界各国也很普遍,只不过,西方现代民主国家更谨慎地平衡学术权威与民意基础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传统更倾向于从专家的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不过,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公众对于表达他们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教育政策研究从专家视角转向公众视角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 2. 转变思维:从观念碰撞转向数据证实

在美国,一项教育政策出台有各种机构的研究报告作为支撑,没有调查数据证实的政策建议是不可取的,这是美国各级教育政策机构的决策底线。而国内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更喜欢引证和争论观点,却很少花大量的时间用数据证实自己的观点。有的研究者以难以获得重要研究数据为由,甚至以怀疑数据的真实性为由,将自己的研究停留在观念大战上。研究者的个人观念很难避免偏见,在观念大战中胜利一方的政策建议如果被决策者采纳,往往很难继续它在观念大战中的辉煌。归根到底,这是研究思维的定势。多年来,国内学者对美国教育理论的兴趣来得更大一些,而对充满数据的英文文献往往不以为然。其实,在笔者看来,想要更全面、深入地剖析美国教育,这些数据类文献的价值更大。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国内教育政策研究者能够转变思维,从观念碰撞转向数据证实。

#### 3. 转变方法:从坐而论道转向实地研究

浏览国内学术杂志上有关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我们会发现“坐而论道”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而“教育政策研究室”中聚集的政府智囊和学院派专家更像是在回答“策论”,而不是作研究。坐而论道是古代文人的传统,只不过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只能使研究者离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远。指望教育政策研究在学术期刊



上得到发展，指望教育政策问题在“教育政策研究室”中得到解决，并不容易实现！实地调查往往是发现政策问题的第一现场，国内教育政策研究者只有从书房和研究室中走出来，才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教育政策研究者研究方式从坐而论道转向实地研究刻不容缓。

#### 4. 转变功能：从建构理论转向服务实践

教育政策研究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研究者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跨学科研究的能力都是为实践服务的。目前，国内教育政策研究界主要还停留在理论建构阶段，甚至还在研究有关教育政策的元理论。我们并不是完全漠视这类研究的价值。不过，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在于解决教育实践问题，而不是拿来装饰理论的。教育政策研究从建构理论转向服务实践从根本上讲关系到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的意义。以美国为例，他们对教育政策元理论的研究非常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解决实践问题，教育政策研究才能得到资助并生存下去。虽说，国内的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社会资源不会支持一个对实践影响力微乎其微的研究领域生存下去。因此，国内教育政策研究亟待思考从建构理论向服务实践的功能转变。

在翻译这项民意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曾有冲动，在国内进行一次类似的教育民意调查。这也是布鲁斯在本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思量再三，也通过对这项民意调查的研究，我们发现，要在中国本土进行专业性的教育民意调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充沛的资金支持。就连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也曾经因为经费问题而差点结束。因此，要进行这项耗资颇多的民意调查，必须找到稳定的赞助商或政府财政支持。第二，专业性的团队。这里的专业包含教育、调查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第三，可以信赖的出版机构或公布渠道（如互联网）。教育民意调查的最终报告只有公开发表才可能扩大影响力与公信力，因此就需要找到出版机构作为合作伙伴，长期支持调查报告的出版。

我们判断在未来一段时期，国内教育民意调查有可能得到快速发展。从政府决策机制的变革来看，据笔者所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民意调查了解公众对特定问题的态度，帮助政府进行决策。从民意调查技术的发展来看，随着中国互联网用户比例的增长以及网络民意调查技术的进步，技术上已经解决了传统民意调查的许多难题，如大幅降低了民意调查成本，减轻了问卷回收和数据统计的工作量，等等。笔者注意到，许多专业性民意调查网站的出现以及一些门户网站设计的民意调查话题，都为国内民意调查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 三、几点说明

鉴于实际情况，本书中每一年的报告仅是对英文版报告内容正文的翻译，英文版中涵盖的调查方法、感谢、广告等内容被一一省略。被省略的内容，我们根据其对中国读者的实际价值进行取舍，并最终整合进中文“代序”。

每年的民意调查的原始材料和报告都在 300 页左右，《卡潘》上发表的都是重

要调查结果。因此我们翻译的实际上是缩减版。正因为如此，本书读者也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后面年份提到前面年份的一个数据，但是返回那一年却找不到这个数据，或者根本没有后面报告中提到的那个主题；另外，读者可能还会有一种感觉，有的主题很大，而主题下面的问题很小，或只有一个问题，根本不足以支持这个主题的内容。这类问题都是由于本书的汇编翻译的只是 300 页材料最终发表在《卡潘》上的那不到 30 页的精华。

从每年英文报告的标题可以发现，它们的名称并不完全统一，即使在乔治·盖洛普一直执笔的 16 年中，名称也是不一致的。这是这项民意调查本身在早期不完善、不成熟的表现。因为这种变化本身就反应了这项民意调查的历史与变化，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基本遵循原文，没有强求各年报告标题的统一。在行文的过程中，“卡潘/盖洛普对公立学校的民意调查”、“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卡潘/盖洛普民意调查”指的是同一项调查。

盖洛普组织在 1969 年与 CFK 合作之前就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民意调查，但那些民意调查并不属于这个系列。1969 年之后，有时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数据对比时，会引用 1969 年之前的调查数据。如 1976 年和 1984 年的调查主题“全国毕业考试”，就出现 1958 年的数据。

报告中有一些表格中的数据加起来并不到 100%，这并不是翻译时的错误，也不是英文报告中的错误，而是因为调查结果汇总的时候会有误差，所以这类最终表格中的数据是约数。

还有一些翻译可能与国内目前的主流翻译不一样，如国内将“School Choice”主要翻译为“学校选择”，而我们更侧重对选择权的强调，译为“学校选择（权）”，如果是“Parental Choice”就翻译为“家长选择（权）”。请读者批评。

#### 四、致 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卡潘》主编布鲁斯·史密斯以及卡潘国际自始至终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信任和委托，这份报告集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与我们读者见面。

翻译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最终的成果包含了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努力。整个翻译工作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刘涛，负责翻译英文前言、1977 年、1988—1992 年的报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佳佳，负责翻译 1976 年、1998—2002 年的报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张萌，负责翻译 1983—1987 年的报告以及关键词对照表和英文人名对照表；上海教育出版社周晟编辑，负责翻译 1973—1975 年的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后生兆欣，负责翻译 2003—2007 年的报告；上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曹书阳负责翻译 1978—1982 年的报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丹，负责翻译 1969—1972 年的报告；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张辰，负责翻译 1993—1997 年的报告。刘涛和王佳佳为本项目的顺利进行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承担了最后的校对工作；周晟协助进行了大量校对工作。刘涛还协助我做了许多组织工作。在与



我的翻译团队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所感动，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书由我负责编辑、审校、定稿，文责自然由我承担。

2008年夏，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桑德伯格讲席教授沈剑平博士在其莅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学期间，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卓有成效的指导；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导师兼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与就业培训辅导中心主任张建成教授，在其2007年11月和2008年6月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期间，两度为我们解答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疑惑；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博士生李涵钰，通过与我们团队成员的邮件往来，为我们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在翻译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黄向阳副教授、王建军副教授、黄忠敬副教授、程亮博士都给予过我们即时的指导和帮助。在书稿的译校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孙翠香、张礼永、王晴、赵鑫，硕士研究生何颖，上海市闵行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曾庆彪等都参与其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对各位师长、同人和广大研究生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本书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对于编译过程中仍存在的疏漏、误译和其他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范国睿

2008年9月10日

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